

世界、国家和我： 《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相关文本分析

黄 敏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策划了被后人称为“一场集体的‘中国梦’”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文章对其中的95篇回函进行了话语分析，梳理了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国梦”的建构特点，并讨论了对当今“中国梦”建构的启示。

关键词：《东方杂志》；中国梦；话语建构；阶级/阶层利益；有机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 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4）04-0009-10

DOI:10.13628/j.cnki.zjcmxb.2014.04.003

2012年11月，在十八大结束不久，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随后他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中国梦”。在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北大学者程美东和张学成进一步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归结为两个层次：一是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梦——财富、名誉、地位，二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和集体之梦——大国梦、强国梦。^[1]虽然“中国梦”涵括了国家和个人两个层次的理想与愿望，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当前对“中国梦”阐释和表述多集中于国家层面，对个人层面的梦想相对忽略。比如，程美东和张学成就认为大国梦、强国梦才是“中国梦”的真正内涵；华人学者石毓智总结了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第一条即是“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2]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无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但中国人关于未来的梦想是否只限于国家层面呢？作为这一梦想的实际参与者，他们又是如何书写和建构自己心中的“中国梦”的呢？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由《东方杂志》所策划，被后人称为“一场集体的‘中国梦’”的“新年的梦想”^[3]征文为例，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以揭示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建构自己心中的“中国梦”的。

一、《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介绍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3月创立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至1948年12月终刊，发行近半个世纪。它紧跟时代的脉搏，忠实地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近现代史的见证，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4]。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舆论界尤其享有盛誉，被视为“中国舆论大多数取向的指示器”^[5]，“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公共舆论与思想文化变迁，无法绕开《东方杂志》”。^[6]1932年因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炸毁商务印书馆而暂时停刊，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复业，首先即恢复了《东方杂志》的出版。1932年11月，刚刚复刊不久的《东方杂志》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征“梦”活动反响热烈，截止到1932年12月5日，《东方杂志》共收到回函160余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发表了其中142人的答函（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这些答复者，从地域上看，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镇江、无锡、苏州、嘉兴、定县、峰县、青海以及南洋、日本各1人，未详5人；从性别上看，男性138人，女性4人；从职业上看，大学教授38人，编辑员及著作家39人，教育家9人，新闻记者12人，官吏12人，艺术家3人，职员4人，学生3人，银行家2人，实业家3人，律师1人，读者13人，未详3人。虽然并非严格的社会学调查，但至少可从中一窥当时的时代思潮和社会心理。由于以上作者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①，被认为“至少可以代表城市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拿他们的梦来估量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代思潮的走向和当时知识人的地位和心情，应该相当可靠。”^[7]

在142人中只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有37人，只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有8人，同时回答两个问题的有97人^②，在这97人中有1人（茅盾）表示“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有1人（俞平伯）明确表示在个人方面“我没有梦想”，这样，真正就两个问题表述了对未来设想的只有95人。为了避免量上的偏差，也为了更好地观察国人是如何建构未来梦想的，本文只分析那95位作者来稿。

二、研究问题及分析方法

如上所述，本文试图通过《东方杂志》所策划“新年的梦想”征文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建构自己心中的“中国梦”的。“梦想是指意识形态下对未来的选择性期待。”^③那么，当时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未来有哪些选择性期待？体现了哪些思想或意识形态倾向？有何意涵？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方法。首先依循扎根理论的路径（Grounded Theory approaches），并不事先假定以上分析项目中的可能类型，而是从文本入手，反复阅读和比较，不断提炼和修订，归纳总结实际存在的情况，再对归纳出的实际类型进行量化分析，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特点。

三、文本分析及意涵阐释

（一）建构方面及其分布

总体而言，95位作者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未来梦想进行了建构，或者说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①世界前景、②国家前途、③社会形态、④社会领域、⑤社会关系、⑥国民期待、⑦个人生活、⑧贡献社会及⑨其他。

“世界前景”指作者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判断。比如，有人认为未来会消除国家之间的差异、隔阂而趋于世界大同；有人希望战争结束，世界走向和平；有人预测帝国主义将“寿终正寝”；甚至有人预计

① 据《东方杂志》同一期记者的《读后感》称，这142位作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合计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

② 记者的《读后感》中称两题同时应征的105人，答复第一题而未答复第二题的33人，答复第二题而未答复第一题的7人，合计142人。这里的数据有误，因为三项相加实际为145人，并非142人。

③ 百度百科“梦想”词条解释，通过百度搜索，也是有关“梦想”的网络文章引述得最多的解释。

日本将破产或被并入中国，朝鲜、印度等国家都获得独立。

“国家前途”指作者对我国命运的希冀。比如，国家获得独立、统一；收复了失地，收回财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等被帝国主义霸占的各种权益；中国及中国人在国际社会获得平等地位甚至担负着推动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等等。

“社会形态”指作者对我国将来社会制度的构想。比如，有人指出中国必将走向共产社会、社会主义或大同社会；有人坚持“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或“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还有人虽没有明确归类，但从其具体描述看，大多数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类，少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或社会主义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混合。

“社会领域”指作者们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社会领域发展的期待。比如，澄清政治、发展经济，改善文化生活，充实国防军备，发展新哲学、新道德、新文艺，等等。

“社会关系”指作者对打破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要求。比如，“在‘人’的意义上一律平等”；“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或“无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对立”；“无所谓贫富悬隔的阶级，无所谓男女差别的待遇”；“人人有饭吃，有事做”，等等。

“国民期待”指作者对全体民众、某个政党或社群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比如，改造国民性；建设民族意识“未来的中国的国民，应各有一个健美的宗教心，即信仰”；“人人守秩序”；“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管理家务，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青年农民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知识分子肯到民间去，使全国民众都能受到教育”，等等。

“个人生活”指作者对自己及家庭的希望。比如，归隐田园或回到乡村；获得个人自由、爱情；有时间或机会读书学习；到全国或世界各地游历；事业有成“能戒酒，能涵养，无疾病，勿懒惰”；“我妻子的体力转强，能够寻快乐；和我女士青的骨痠霍然痊愈，变成一个康健活泼的孩子”，等等。

“贡献社会”指作者期待自己在国家梦想的实现或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尽我的力量去教育农民指导农民，叫他们知道，农民才是真正生产者和国家的主人翁，只有农民劳动者才应该享受一切。”等等。

“其他”则包括一些比较独特而无法归类的愿望，比如，“我梦想在未来的中国《东方杂志》每年至少有四千万份的销路”，“我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或“我只想成一个古代的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等等。

以上建构方面在“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中的分布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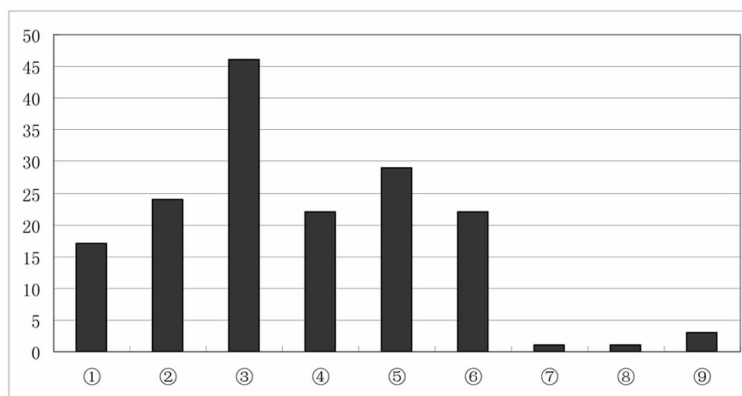


图1 “梦想的中国”中的建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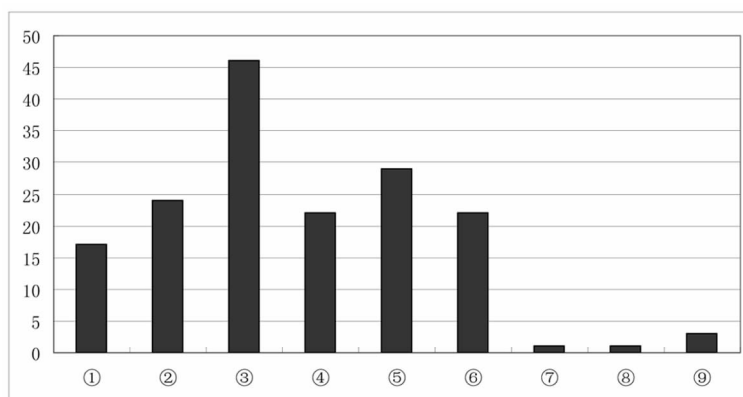


图 2 “梦想的个人生活”中的建构方面

(二) 建构特点及其意涵

从图 1 和图 2 看,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梦”的建构呈现出如下特点:

1. 世界、国家和个人三位一体,“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和“世界梦”

以上 9 个方面中,除了第⑨外,其他 8 个方面分别属于世界(①)、国家(②-⑥)和个人(⑦-⑧)三个层面。这表明,虽然国家层面的要素更为丰富,考虑得更为充分,但当时的“中国梦”并非仅限于国家层面,而是对世界和个人都有涉及,它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和“世界梦”。

世界、国家和个人三位一体还表现在作者们的思想认识与建构方式上,不少作者指出未来的中国面貌取决于未来的世界形势,或者国家梦想是个人梦想实现的前提,分别如下例(1)和(2):

(1)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要有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该先有梦想中的未来世界。

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这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的中国呢,当然也是这个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柳亚子)

(2) 除了犹太人以外,是没有人能够离开他的国家而独存的。先有了“梦想的国家”才能谈“生活的梦想”。倘若先有了“生活的梦想”再“梦想一个国家”去适应,那就很危险;我们中国就因为这类人太多,所以要发生“问题”!这问题,是很可痛心的!

我个人的“生活的梦想”,就是努力于我在问题一中所说的,我所属于那一方面的“内在实力”的发挥,并祈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黄守中)

另外,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有着较高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但很多人对未来世界和国家的设想并没有进行抽象的阐述或宏大的叙事,而是立足于日常生活,通过芸芸众生具体而微的感受和愿望来勾勒对未来世界和国家的期盼。比如,在下例(3)中,燕京大学教授洪业从吃饭、穿衣、住房以及感情等个人生活必需的方面来设想未来的中国;在例(4)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人能用上抽水马桶;在例(5)中,作家谢冰莹通过“有书读”、“有游艺”和“有休息时间”勾勒了人民在一个没有国界、民族和阶级的大同世界中的幸福生活,并强调中国也是其中之一。

(3) 将来的中国:全国的人,都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洪业)

(4)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谷城)

(5) 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工作,这工作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和整个的人类所需要而做的。他们过

着很快乐的自由平等底生活；有书读，有游艺，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他们享受着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一切权利。这是没有侵略，没有剥削，没有嫉妒和欺骗，没有战争和屠杀，有的是共同愉快的生活，努力前进的精神！互相帮助，互相亲爱，全世界成了一个组织，而中国就是这一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谢冰莹）

以上表明，早在上世纪初的中国，人们心中的“中国梦”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朴素的人本主义观念。他们没有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国家与个人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们也没有空谈国家梦想，而是感性地向表明生活在这个世界和国家中的人们平等幸福才构成一个理想的世界和国家。

2. “世界大同”与中国的国际责任

在“世界梦”中，“世界大同”成为中国人对未来世界最为普遍的期待。在总数为17人次的设想中，有11人次（约占65%）明确表示未来世界必然是大同社会，而且中国在这一发展中起着领导作用，甚至成为大同世界的主体，如：

（6）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到了我国强盛以后，再为世界上打不平，希望于百年以内，与全人类共同促进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陈时）

（7）结果大战给予了中国新的生命——使中国一变而成为东亚强国。中国内部既团结一致，再联合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及各国被压迫的阶级，三民主义的实行，便更轻而易举了。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以三民主义为原则的大同世界，便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了。（徐伯璞）

这说明，即便是在当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心怀远大，视野开阔，不仅关心本国前途，而且心系世界的发展，并相信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责任感，“中国梦”是一个有国际担当的民族梦想。如果联系到“国家前途”中的相关叙述，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不少作者在谋划祖国的未来时也设想到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所承担的重任，如：

（8）由此，中国将为世界和平之天使，真正人的生活的建筑者。（曾觉之）

（9）至此中国已为国际团体中重要之一员，世界和平之维持，中国亦负重要之责任。（龚德柏）

3. “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

考虑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正如征稿信所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的时代背景，“国家前途”理应是最为关注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在与国家直接相关的四个方面中位居第三，“社会形态”，也即未来的中国将会走上何种社会制度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作者们关于国家未来的社会制度提出了许多设想（如前文所述），但最突出的莫过于社会主义，有的作者直接点明所期待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有的作者则从各方面进行详细描写，但所描述的也明显是一个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社会，分别如下例（10）和（11）：

（10）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努力充实国防，以保障整个民族的安全。（毕云程）

（11）我梦想未来的中国是这样的：

一、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

二、在教育方面：举行大规模的彻底扑灭文盲运动，把现存的不合理的特权阶级的教育制度推翻，致变为合理的科学的建设的大众的教育。

三、在文化方面把一切现在只是少数人所有的文化机关都公开给大众。而大众有了闲暇，有了识字的权利，自然便有方法来享受人类智能的结晶，一切的文化。

四、在社会设施方面：根据地方人口的多寡，到处建设设备完善的医院，以解除人民疾病的痛苦；到处建设完善的大众食堂，洗衣所，使操家业的妇人从厨房里，家庭里解放出来；到处建设托儿所，以减除养育儿童的烦难；到处建设电影院，戏院，音乐院，俱乐部，图书馆，公园，使大众免费可以有休憩，享乐，提高精神生活的机会；建设极多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的大众的住宅，使人人都有安居之所。

五、人人都劳动，人人都有劳动的机会，每人每日的工作时间，尽可能的缩短。

六、对于妇女，把妇女的地位，提高到真正和男子平等。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都完全和男子有同等的权利。对于婚姻育儿等问题，妇女完全有自主的权利。

在实行右面的计划的初期，货币是仍然免不了要使用的；但到了一定的阶段，即经济组织我完全社会社会主义化时，货币便自然会消灭的。

军队和警察，最初也依然是要的。但到了国外既没有帝国主义的国家存在，国内没有阶级的区别时，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废止。

政府也是一样。最初的民众的政权——政府不能不是强有力的，但到了经济的组织既经完全社会主义化，消灭了阶级时，政府再不是为阶级压迫阶级的东西，政府的性质改变了。

到那时，便将出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无阶级无榨取无压迫的快乐的新中国！（张宝星）有的设想则是一种融合了其他特点的社会主义，如上例（5）中对中国的叙述，又如：

（12）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张申府）

在征文中，社会主义或混合社会主义的主张约占总数的61%，这表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自20世纪初就成为中国的社会共识，也是当今中国梦的重要历史来源。

4. “田园”、“教育”、“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个人梦”集中在“个人生活”和“贡献社会”两个方面，在这里，作者们对自己的未来做了种种规划，归隐田园、致力教育和投身革命成为三种主要选择，直接或间接表达这些愿望的约有50%以上。

希望归隐田园的作者，对田园生活的描述与古代文人的隐居生活非常相似，如以下《生活周刊》编辑艾逸生对自己未来田园生活的描述：

（13）我的理想的个人生活。假如环境允许的话，那就是说：在时局平靖国泰民安没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诸种种压迫的下面，我是要毅然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像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平日的的生活是：除了和一家人努力农事之外，闲暇的时候，有时是带着山妻爱子到田陌间跑跑，看看自己亲自劳作生长出来的稻麦，是何等的开心。高兴极了，将平日教给犬子唱的山歌，叫他唱起来，自己和山妻也许一块儿和唱着。有时和村中的老者碰着了，很殷勤的请他到酒肆中喝一杯，五个铜板的落花生剥吃着，谈一回过去的兴亡沧桑，什么豪绅张三早就该枪决了。想不到他从前巧取豪夺来的财产，现在竟充了公；什么李四从前是个东乞西讨的穷光蛋，现在竟也过得很好，政府分给了很多田给他耕了。可见得社会也有公平的日子。谈到这里，彼此慨叹了一回，又多喝了几杯；有时，有彼此因各有各的工作，多时不见的老朋友，忽然的自远方来了。

很天真的彼此手挽手的跳笑了一会。并请他吃一顿“普罗”饭，纵谈天下事，臧否当代的人物，某也投机应该打倒；某也忠实应该拥护。像这样欢欢喜喜的直等到彼此谈的痛快的兴尽而别。此外假如时间还有的多的话，我还要分出时间来去读我所要读的书，尽我的力量去教育农民指导农民，叫他们知道，农民才是真正生产者和国家的主人翁，只有农民劳动者才应该享受一切。像我这样的生活，当然，无疑的是一种安分守己很平凡的生活了。可是在中国无一块干净土的今日，就是很平凡的生活，也是无福享受，等于梦境，它的实现的难是难于上青天！

(艾邈生)

在希望致力于教育的作者中，有的像上面的艾邈生，希望在隐居田园的同时也从事教育；有的则是以教育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如以下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对自己个人生活的描述：

(14) 我的个人生活，完全为武昌中华大学活动，我的幸福，亦纯粹为此校牺牲。我梦想此校在五十年以内，能够达到牛津、剑桥、哈佛、耶路、巴黎、日内瓦、庆应各大学规模，并发挥最高的大同思想，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的先锋勇士。(陈时)

投身革命的愿望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为宽泛地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一种是较为狭义的阶级革命，尤其是与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一起夺取政权的革命，分别如下例(15)和(16)：

(15) 我便是想用我有限的力量，放到建设新社会的斗争过程中去。同时，对于新社会文化工作的建设，我想努力负担起来。(张锡昌)

(16) 我个人的梦想，人生再没有比有一个机会将我能尽的些少力量贡献给工人们之最后胜利的目的为更有意义了。(伊罗生)

以上三种选择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身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或者说所受到的思想影响。归隐田园明显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遗留，致力教育是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天职，投身革命，尤其是与工人、农民等一起夺取政权的革命则显然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有关。

5. “反省”、“期待”、“认同”与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兴起

如前所述，本次征文相当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社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而从以上有超过60%的作者希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有不少作者愿意投身革命的表现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左”倾，不过具体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如果以对社会现状、未来社会（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的态度为指标，本次回函的知识分子们大体持有“反省”、“期待”和“认同”三种态度。

“反省”包括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本阶级的批评，从而间接（有时是直接）表达了作者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和对无产阶级的支持。比如，在下例(17)中，作家金丁^①对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期望新的社会能有改变；在例(18)中，持志大学学生娄立齐因自己所出身的阶级而痛苦不安，期盼将来的社会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在例(19)中，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对自己所属的阶级、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阶层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表达了钦敬和期待。

(17) 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为什么甲能享受乙不能享受？未来的中国是不该如此的！（金丁）

^① 原名汪金丁，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秘书。《东方杂志》原注为“读者”，实际身份应为作家。

(18) 我生在现今的中国,虽幸免冻饿,但良心上却再痛苦也没有了;因为我所能贡献于社会者,远不如我之得自社会者。方今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并不贪懒,而反天天在挨饿受冻,且有易子而食者。和我相较,我似乎可以归入于掠夺者一方面了。

我已认识一点掠夺者应受制裁的道理。但我的现实生活,却与这个道理不很吻合,使我良心上大感痛苦。所以我梦想中的中国是可以解除我这种良心上的痛苦的。至于她的轮廓,则一言以蔽之曰:已无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对立了。(娄立齐)

(19) 三五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探索,才使我自觉我自己的地位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附属分子,并且这个特权阶级是没有将来的。不幸我做了这个阶级的附属分子,也只得随时流而俱亡。梦想或希望?不,不如少存一点幻想,免得多尝没落的悲哀。

这个特权阶级——我是其附属分子——它的命运恐怕不久了。现在这个阶级为了自己的特权作最后的挣扎,但苟延多久,是很难保险的。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另外一个阶级,因私有财产的发展而疏隔起来的人类之另外一个集团。现在这个阶级虽在重重的枷锁之下绝叫地斗争着,但在他们的痛苦的绝叫中,我已感觉到他们的胜利的欢叫。

未来的中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现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他们——工人农民和一切劳苦大众同盟在一起猛向着帝国主义及其在华黑暗势力作无情的搏战。

那真是铁血英勇的战斗,不但中国史上至今未有,即世界史上亦属罕见,甚至于弄得一批没出息的知识分子望之畏怖而咒骂他们的斗争,自己情愿在帝国主义强盗绅士们的“和平”羽翼之下暂时偷安。

智识既不足帮助中国之解放,还要咒骂那一大批求解放的人们。究竟是谁不应该?哦,可怜,知识分子之无知无识!(何思敬)

“期待”指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期待,对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的期待,以及对知识分子为大众服务的期待。这些在上文不少例子中已有体现,比如在例(10) - (12)中作者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例(13)中《生活周刊》编辑艾述生认为“农民才是真正生产者和国家的主人翁”,以及例(17) - (19)中作者们对未来社会和无产阶级的期待。又如下例(20)中北京大学教授盛成对农民的期待,例(21)中浙江大学教授微知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以及例(22)中银行家和学者章乃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

(20) 最后,我说,要把未来的中国,放在青年农民的肩膀上,使他们来创造,让他们来生产。(盛成)

(21) 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没落得顶快的。怎样以仅有的一点的“文化”,“教育”,“政治”的力量,来开发新的“民众的力量”,那是他们的唯一的生活的使命了。(微知)

(22) 所以,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章乃器)

“认同”则是指有的作者甚至希望知识分子或自己与无产阶级一起夺取革命的胜利,如上例(15)和(16),又如:

(23) 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工具在全中国的民众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团结大决战下崩溃,发展生产,发展科学,发展文化的政府成立。(汪曼铎)

(24) 我梦想做一位革命的战士。或者是革命阵营的一位走卒,跟随在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之后;或者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位领导,号召千千万万的大众,起来为实现未来中国的梦而斗争!(张宝星)

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知识分子们所表现出的以上态度尤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此次回答征文的作者，绝大部分应当出自官僚、地主或资本家家庭，正是所谓的“榨取阶级”或“特权阶级”，但他们大多数却背叛了本阶级的利益，对自己所出身的阶级和阶层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批评，强烈要求阶级平等，对无产阶级表达了钦敬、支持或认同之意，体现出了充当中国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the organic intellectuals）的特质和倾向。

“有机知识分子”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 Gramsci）提出的概念。葛兰西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之外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但每个社会或明或暗地赋予一些人以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或者捍卫现状，或者挑战现状，他将担任这些角色的人称为“有机知识分子”^[8]。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关注有机知识分子在挑战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中的作用。他探询，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挑战资本主义的知识霸权？如何让民众脱离旧有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正是有机知识分子建构着可替换的生活观、世界观，因此，无产阶级阶级要反抗统治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帮助至关重要。虽然理论上社会中的每个群体都创造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界定和捍卫群体的利益和要求，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组织要素方面很缺乏，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当然重要也很有用的是，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个体性的，采纳它的计划和思想，融入无产阶级之中，成为并感到自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9]他们由此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发挥着教育群众、领导革命的作用。

无产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认同并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甚至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在世界政治中并不少见。英国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分析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后指出，“粗略言之，国家及其劳工运动越是落后和欠发达，越是欢迎外人充当领袖和对话者，实际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如作为律师或教授——常常具有实际的价值。”比如，在英、美、德、法等发达工业国家，一个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成为一个重要的体力工人工会的领袖，是不可想象的，但在1979年的意大利，钢铁工人的总书记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英国工党和共产党基本上作为无产阶级的实体发展起来的，仅有少量相关联的知识分子，但沙皇俄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或党派，则压倒性多数地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宣称——实际上也是——代表工人。^[10]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国家及其劳工运动”都“落后和欠发达”的状态，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1]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已有许多研究，但多关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对这一群体中众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对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社会转型期的所思所想则少有提及。《东方杂志》这一次无意中促成的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调查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的态度，生动再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代表无产阶级在国家梦想中所表达的利益诉求。

四、余 论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由《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中的95篇征文为例，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揭示了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建构自己心中的“中国梦”的。对历史的追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今天服务的，从某一方面来说，本文的研究也不例外。自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以来，关于“中国梦”的讨论就成为国内外舆论界的热点，人们从不同方面进行着丰富和深化，以期建构一个能激发和指引国人最终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和理想。而“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具有深远的历史继承性，这样，梳理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回顾先辈们的所思所想，以为今人提供借鉴，理应成

为当今中国梦建构的重要一环。通过对8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中国梦”的文本考察,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一,“中国梦”是一个世界、国家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梦想。我们的前辈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国家与个人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个人前途取决于国家的未来,同时又强调生活在这个世界和国家中的人们平等幸福才构成一个理想的世界和国家。相比于对国家层面梦想的片面强调,这种看法赋予“中国梦”极为丰富的内涵和感召力。

第二,“中国梦”是一个具有民族自信和国际担当的梦想。80年前,即便是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国民众仍心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相信中国将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责任感。在当今世界局势多变,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不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情况下,这种民族自信心和国际责任感依然十分宝贵,而且是对各种“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击,是我们建构当今“中国梦”的主要精神来源。

第三,“中国梦”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主导同时包容多元选择和自由空间的梦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自20世纪初就成为中国的社会共识,因此,当今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在这一主导思想之外,我们的前辈在个人生活层面尽情抒发了各种不同的愿望,有的脚踏实地,有的天马行空,这实际上表达了对“中国梦”强大包容力和广泛自由度的期待。在坚持国家主导思想的同时又给予个人充分发展和自由选择的空间,这既是前辈的期待,也是我们作为当今“中国梦”的建构者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四,“中国梦”是一个反映不同阶级/阶层利益诉求的梦想。从80年前的“中国梦”中我们清楚看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的。这一事实生动表明了以下两点:首先,对国家未来的期盼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社会转型期,新兴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常常更为强烈;其次,每个阶级或阶层都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是本阶级/阶层利益最活跃、最具斗争性的代言人。与之相应,我们在“中国梦”的建构中也必须认真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在当今人民利益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使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维护,尤其是如何关照到新兴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最大范围地实现社会公平?如何动员和团结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有机知识分子,使之参与到中国梦的建构和实现中来,共同寻找各阶层各方面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让“中国梦”真正成为全体国民自觉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 [1] 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述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2).
- [2] 石毓智.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J].人民论坛,2013(10).
- [3] 马九器.孩子的梦承载着百年中国梦[N].华商报,2010-09-04.
- [4] “杂志的杂志”《东方杂志》简介[N].凤凰网,2009-04-28.
- [5] A 伊文.中国与苏联[M].莫斯科,1924.
- [6] 姜义华.序[A].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 [7] 一沙.也谈1933年新年的梦想[J].书屋,2013(9).
- [8] Hoare Q, Smith G N.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d, 1971: 8. 和 A. P. Maingot. Epistemic Organic Intellectuals, in Mauricio A. F. (org.) *Changing Cuba/Changing World* [M]. Nova York: Bildner Center for Western Hemisphere Studies, 2008: 23-24.
- [9] Hoare Q, Smith G 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d, 1978: 462.
- [10] E. Hobsbawm. Intellectual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J]. *Maxism Today*, July, 212-220. p. 213-214.
- [1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41.

ABSTRACTS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Dream* in Taiwan: Taking Taiwan' s *United Daily* as an Example

Wu Liying & Guo Wenping

Drawn on empirical data to construct a corpus of *Chinese Dream*, this corpus – based study investigates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eam* in Taiwan' s newspaper of *United Daily*. The finding of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United Daily*,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eam* is usually framed and represented with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cross – Strai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Usage of linguistic units such as “co – construct,” “co – harmony” and “dialogue” points to a highly – anticipated expect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The World , the Nation and I: A Study of Articles on “Dreams of New Year” in *Eastern Miscellany*

Huang Min

In the 1930' s , *Eastern Miscellany* hold an essay activity called “New Year' s Dream” which was later known as “a collective ‘China Dream’ ”. Based on the discursive analysis of 95 return letters ,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a Dream” construct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time , especially the intellectuals ,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day' s *China Dream*.

From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o Media Accessibility: Live – subtitling , Audio – description and Audio – subtitling.

Aline Remail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VT) , traditionally known for interlingual subtitling has grown into what might be called an extended family these days. While the popularity of the forms of translation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continue to evolve ,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has increased demand for AVT and given rise to new and alternative. The paper discusses new forms of AVT – live subtitling using speech recognition , audio – description and audio – subtitling , which are approaches to make media access.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 have led SDH audiences to demand interlingual as well as intralingual subtitling , bringing subtitling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closer to regular subtitling. Foreign and multilingual language productions create a need for the combination